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演进及原因

安 然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到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兴起。其中,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为确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前十年,改革开放的深入推动,现代化研究步入鼎盛期。近十年左右,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出现微观化、技术化、去历史化趋势。这是现代化理论成功普及、改革实践导致理论内在张力升级,以及国外学术转向的共同影响所致。当前,现代化研究需要重新定向,维持多元、活跃的研究格局。

关键词: 改革开放; 中国现代化研究; 罗荣渠; 再定向; 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 K0; K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21)10-0182-07

20世纪是大变革的时代,空前的创造与空前的毁灭同行。造成这一巨大悖论的核心变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前所未有的扩张和加速。被动卷入这个进程的中国,不断在抗拒与融入之间、在不同方式与程度的融入方案之间犹疑抉择。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全面、主动推进现代化的新起点,现代化研究由此成为中国社会人文科学界的重大课题。然而,世事流转、时代迁移,中国的现代化研究近四十年来经历了一段不寻常的起落变化。

一、改革开放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研究在美国兴起。作为一个在冷战背景下崛起、由诸多社会人文学科共同推动的理论集合,现代化理论构不成严格意义上的学派,也没有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只是试图以一套基于西方经验的现代化范式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战后发展提供方案,但无论如何,它对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和发展方向还是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其要旨包括:参照西方现行社会结构和制度架构提炼的现代性范畴,如机械能源的使用与知识迅速增长、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体系、

民主代议和官僚科层体制、社会流动、高度差异化和互赖化的社会结构、工具理性、个体本位和开放乐观的现代人格等;以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为原型概括的现代化范式,包括工业化、民主化、法治化、城市化、专业化、世俗化等;传统—现代两分法、线性进化论、社会发展的内因论解释等方法论。

中国对现代化的自主探究早于此。梁启超是系统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先行者。他对戊戌变法和现代政治体制的反思,对自由理念、进步观念、科学精神和文化概念的阐释,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变革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根本”逐层推进的分析,以及“世界之风潮,由西而东,愈接愈厉,十八九世纪所演于欧美之壮剧,势必趋而集于亚东”的预言^[1],都体现出他对现代社会发展方向、层次、内涵和演进规律的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中国思想界独立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的努力大规模展开,东西方的文化碰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维护国本还是力推西化、工业立国抑或农业立国等问题都引发了热烈讨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平民主义各家争鸣,新中国成立后统一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史范式之

作者简介:安然,197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下。60年代,当中国史学界得知日美两国在日本箱根召开现代化问题研讨会时,曾以现代化理论对抗唯物史观为由进行过批判。直至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才成为时代的共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政府和学界普遍意识到中国的改革实践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中国社会科学亟须开放、创新,“社会科学要为现代化服务”,对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社会巨变做出积极回应,为现实问题提供理性思考和解决方案^[2]。在政策鼓励和开放的氛围中,中国现代化研究进入了起步期,80年代早中期到90年代中期,社会人文学科关于现代化的研究盛况空前,呈现百家竞出、多元互动的热烈景象。

首先,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及相关社会科学成果大量引进。西方现代化理论在1980年被引入并得到初步讨论,《社会科学》杂志“学术动态”专栏就讨论结果进行过汇总^[3]。此后,各类现代化理论以及与现代主题相关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比较政治学、发展政治学、新儒家、比较历史学等西方社会人文科学著作批量引进,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滕尼斯、帕森斯、罗斯托、英克尔斯、西里尔·E.布莱克、塞缪尔·亨廷顿、巴林顿·摩尔、罗兹曼、艾森斯塔特、海尔布罗纳、格尔申克龙等西方学者逐渐为国内学界所熟悉,现代化的概念和研究范式日益普及,在学术论著中随处可见。

其次,各学科广泛参与,科研、教学、社会普及全方位推动。这个时期学术研讨风气浓厚,各大高校、科研院所,乃至中央部委和各级党报经常召开以现代化为主题的全国性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少则数十人,多至两百余人。各社会人文学科普遍介入,各学科经常举办跨学科研讨会或联合承接课题,社会学和政治学在概念和范式的引进方面走在前列,经济学、法学、心理学在现实问题的突破上先行一步,历史学和哲学对于时代的变动反应迅速,文学、新闻学等也加入其中。“七五”“八五”计划期间,一大批现代化研究的课题入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国家级重点项目,如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张琢主持)、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比较研究(罗荣渠主持)、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

(章开沅主持)、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孙立平主持)、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研究(朱庆芳主持)、国外发展理论翻译(中宣部承接)等。全国各大高校也纷纷开设发展政治学、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等相关课程。

最后,学术研究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关注方向性、结构性的重要议题。各学科的现代化研究基本上处于译介国外理论、普及常识、确立论纲的阶段,但问题意识和研究框架很明确:现代化的契机与模式、内涵与范畴、战略与时序、标准和影响因素等基本理论问题颇受关注,市场化的构成与条件、工业化与城市化、政治民主与经济的关系、社会转型与社会冲突、民族主义、社会流动与社会保障、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等宏观的现实问题讨论热烈,合法性危机、新闻自由、民众监督与权力制衡等话题也得以公开讨论。

这一时期现代化研究的井喷标志着长期禁锢后的一次思想解放,形成了一些突破性的共识:现代化是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中国需要对外开放、学习西方;现代化是一个有机整体,除了物质技术层面,还包括制度和价值层面,工业化、民主化、世俗化是大方向;商品经济促进生产力是现代化的基础;现代化的多线性;中国应根据自身独特经验建立自己的现代化学派,为世界性进程贡献中国方案。

二、史学领域现代化研究的开展及贡献

初期的现代化研究虽然构想宏大、氛围热烈,但仍缺乏独立的理论体系,尤其是一套系统的现代化历史观,而这正是历史学应该担当的责任。

这一时期历史学的现代化转向主要遵循以下路径:一是学术取向和标准的“现代化”,即在某个传统的研究对象中注入现代化的理念和思维,做出与以往不同的分析和结论。这一时期关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大多采取了这一研究思路,其中尤以章开沅先生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为代表^[4]。二是研究主题的“现代化”。李时岳提出在以往的研究领域内“实现研究重心的转移”,开发新的研究对象和主题,“开展多层

次、多领域的研究”^[5]。自 80 年代以来兴起的一大批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即属于此类。以此为发端,开辟出晚清新政史、商会史、城市史、民族资产阶级研究等新的研究领域。三是研究思路的“现代化”,以现代化为脉络,对某段历史进行重新梳理。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很多中国近现代通史类著作采用了现代化作为历史主线,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直接以“现代化”为题,按现代化的不同专题整合全书^[6]。四是研究方法的“现代化”。1979 年,《历史研究》和《世界历史》两家顶级史学期刊分别登载黎澍和陈之骅论文。两文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框架内呼吁研究方法的革新,主张淡化阶级斗争史观、强化反思传统和现代化的主题^[7]。此后,历史学科的现代化转向被明确提出并广泛实践。五是比较现代化研究。通过介绍早发现代化国家成功经验、比较不同国家现代化的异同与成败,总结现代化的规律。世界史领域的现代化研究多属于此类。

相对于以往阶级斗争史观一统天下造成的偏狭、沉闷、机械的研究局面而言,这些都是重要的突破和可喜的进步。不过,要建构一个既有理论高度又符合现实需要、体现学术创新且兼顾理论衔接的史学新范式和现代化史观,还需要一种提纲挈领、切中要害的理论阐释。在这样的背景下,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脱颖而出。

作为中国第一代现代化研究的代表人物,罗荣渠教授在短短十余年里,主编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主持翻译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世界经典名著,其本人撰写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续篇,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化理论;另一方面以西方现代化理论更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着力发掘两者的共同点和相似性,同时会通中西、融合史论,提炼出一套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为确立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这套富于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对国内原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做出了重大改良和突破,明确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方向。其主要思想包括:(1)一

元多线的范式论。将生产力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因(一元),同时认为它并不能直接和立刻改变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力并非仅对应于一种生产关系,而是可以与彼此平行、无分高下的多种生产关系相对应(多线),这就突破了以线性进化的生产关系为标准的单线论教条马克思主义,承认了多种社会制度并存竞争的可能性^[8]。(2)内外因结合的动力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总是众多的内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与奇特的凑合”^{[8]72},外因即社会结构之外的特殊因素,作用是打破较为稳定的先期结构和自我维持的内循环机制,内因即新的生产力、阶级斗争等内部渐变力量,其对社会变革影响的大小由原有体制的包容性及所能容纳的多元因素决定,哪种内因起主要作用则取决于社会系统的分化程度和社会整体的发展程度。这一论断破除了阶级斗争决定论的内因论窠臼,肯定了外源动力的意义。(3)以生产力为基础推动文明兴替的文明史观。将文明作为人类历史的基本单位,以生产力驱动的文明兴衰更替取代由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发展五阶段,明确了现代工业文明兴起是人类历史的方向^{[8]49}。(4)以现代化为方向的革命史观。东亚现代化分四步走:衰败化、边缘化半边缘化、革命化和现代化,“革命化”是“现代化”的前提,“现代化”成为“革命化”的方向,以现代化范式吸纳整合了革命范式^[8]。在这套理论体系中,“现代化”是一个内涵明确的文明进程,囊括了以工业革命为中心、以生产力为动力,从制度建设到文化重构、从国家转型与国际秩序重建的一整套重大变革^[8]。因此,他主张为现代化“正名”,反对刻意区分“近代化”和“现代化”,并将其分别对应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做法,因为这会形成误导,将“现代化”降格为一个相对的时间范畴,并固化在特定生产关系的窠臼内;他也反对片面强调传统,认为“传统”一词成分复杂,必须以现代性为标准进行筛选,有利于、有助于、至少相容于现代性的传统才有价值。

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也是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扩展和修正。中国对现代化理论的最初了解是从摘译东德、匈牙利学者以及美国修正派学者的

批判性科普文章开始的。中国大规模引入现代化理论之际,现代化理论在美国高潮已过,质疑和反思成为主流。可以说,中国对现代化理论的局限——单线论、内因论、传统—现代两分法等从不缺少认知。因此,引进这样一种存在明显缺陷的西方理论风险很大,将同时面临意识形态和学术两方面的阻力。但出于对时代发展主题的敏锐感知和理论优劣主次的理性判断,罗荣渠指出“对于这些新理论,当前应注意的还不在于它们的理论体系的成熟程度和研究结论,而是应注意它们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它们从总体上提出了哪些社会科学的新课题,开拓了哪些新领域,可以作为我们开展现代化问题研究的借鉴。”他所看重的,是现代化理论对现代性基本维度与内涵、现代化主要方向和内容的阐释,以及那种结构主义和历史比较的分析方法,这些正是中国的现实发展所迫切需要、而原有社科理论最为缺失的东西。必须承认,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它不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扎根于启蒙思想传统和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之中的,剔除掉特殊时代背景和意识形态化造成的偏狭局限之后,这一理论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性。为了弥补现代化理论的缺陷,他对现代化的局限性和负效应提出明确警示^{[8]171-172},扩大并修正了现代化理论的内涵,在引进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同时,也引进了现代化修正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修正性、批判性甚至对抗性发展理论作为补充,与现代化主题相关的各类社会科学理论的经典论著也荟萃其中。

在实践层面,罗荣渠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新视角诠释世界现代化进程、反思中国现代化,进行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启蒙。首先,直言揭示自身不足。他非常强调世界文明在现代化大趋势之下的交流汇通,认为存在一种由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公平所决定的普遍一致性,中国要向世界开放和靠拢。他对中国现代化的判断是:中国属于外源性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可以搞,但不能从内部自发产生,决定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不是文化传统,而是旧制度被破除的程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一系列失误:从19世纪早期之前选

择机会的自误,到19世纪后期制度变革的延误,到20世纪前40年现代化的扭曲和断裂,中国要想发展,必须融入世界。其次,提出建立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他认为,创建现代化研究“中国学派”就是中国人在世界现代化的大趋势下,通过吸收、借鉴现代化理论,结合自身需求与实践,提升和探索自身现代化方案的理论尝试。只要是对自身现代化道路进行探索的理论,就是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理论。最后,从正反两面推动社会观念转型。从理智上讲,中国若不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转型,很难汇入世界潮流,遑论有所贡献。从感情上讲,中国若不预先确立自身主体性,则很难跨越民族心理的障碍,接受西方化色彩强烈的现代化理论。罗先生以其深厚的理论素养和高超的论证技巧,将两种需求很好地结合起来,尽力消除基于民族情感、意识形态、学术惯性思维等造成的障碍,推动社会观念的“脱敏”和开化。

三、中国现代化研究的转型及其原因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前十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更充分地融入了世界,社会意识进一步觉醒,现代化研究步入繁荣鼎盛期。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广受认可的学术范式扩展到社会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应用于高校教学和政策咨询,甚至进入中学历史教科书。现代化研究逐渐从宏观走向中观层面,在工业化、民主化、世俗化的大方向下,注重理论体系的细化和具体问题的考察,以推动制度构建、落实社会启蒙。在理论建设方面,继续发掘和辨析马克思经典论述中的现代化元素,比如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和人的发展的论述;西方现代化研究成果的译介进一步推进,引进版图书在中国图书零售市场中的码洋比重和品种比重都持续增长,国内图书市场在更多、更快地引入优秀的西方学术著作和社会读物方面,日益与国际市场实时对接;在现实考察层面,市场化、民主化与威权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转型与文化重构等现代化结构转型诸问题成为研究重心,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范例和失败案例,比如东亚资本主义、威权政府与东亚文化,拉美军人政权、民众主义和

增长模式等问题备受关注。有关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重新审视和认定上有突破性进展,改革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国企改革、政企关系、腐败、政治体制改革、城市化与城乡差距、中产阶级、新农村建设、弱势群体等都是热门论题,每年都有大量研究计划获得国家性和省部级课题资助。

近十年左右,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微观化、技术化、去历史化的趋势。从研究主题看,现代化研究多聚焦在具体的“器物”层面,重大体制问题及结构性因素的讨论趋于减少,微观化、技术化、“中性化”选题增多。从1998—2020年中国知网上以“现代化”为主题的论文情况来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关的研究最多,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次之,三者合占半壁以上江山。以现代化转型、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等中观研究为主题的论文仅占两成,近十年来这一趋势尤为明显。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稳定、民工荒等改革难题也有论及,但在论述角度、深度和创新性上有待拓展和提升。在学科分布上,呈现现代化研究“去历史化”、历史研究“去现代化”的趋势。行政学与行政管理、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农业经济、教育学等学科发表论文数量占总数的大半,法律、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现代化选题比重偏低,而历史学尤为明显,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历史论文占比不足5%,近十年论文发表曲线陡降。在研究方法上,“现代化研究”整体轮廓模糊化,以现代化问题为平台的跨学科研讨盛况不再,一度在现代化研究的旗帜下汇聚起来的理论群落分解为不同学科领域的边缘化分支,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内关注具体问题。历史学科内,出现了终结宏大叙事、走出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声音,现代化视野下的世界历史比较研究悄然让位于新兴的全球史研究。在理论取向上,观点分歧趋于扩大,并有向底层共识蔓延之势,市场界限、政府角色、民主和法制路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等问题争议很大。

总体来看,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整体形态模糊到明晰、再到模糊的“倒U曲线”:最初,现代化研究在各学科内部零散进行,

多限于技术层面,基本未脱离“四个现代化”的范畴,其中农业现代化占据讨论的绝对中心;随着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普及和中国现代化理论框架的形成,现代化研究作为一个虽不构成学派、但粗具形态的理论集群崛起;近十年则再次回归各学科。

这一转型头绪繁多,原因复杂,大致是学术因素与社会因素、内在困境与外部压力共同促成,兼有积极面与消极面。

从学术角度看,这首先是现代化理论成功普及的结果,符合宏观理论发展的规律。早期现代化研究的主要功能和意义在于确立框架、引导方向。当最初需要据理力争、引经据典予以证明的主要框架和基本命题被默认和接受,隐身为前提时,第一代现代化研究的历史作用大半完成,后期研究必然随之沉入微观。由于第一代、第二代现代化研究学者们的努力,现代化的理论框架、研究范式和关键命题已经重塑了中国社会人文科学的基本面貌、底层思维和主要问题意识,这一成就无可置疑。从理论发展的规律看,多元分化、历经蜕变是学术发展的常态。从宏观理论圆融一体的早期框架中分化出来的各派沿不同方向穷根溯源、极致探寻、乃至撕裂争吵,为多方探索提供了可能。此外,就方法论而言,早期现代化研究思维宏阔、涵盖性强,跨越不同领域和学科,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过于宏大的理论构想容易受制于有限的研究实践,宏观与微观脱节、论证追不上思想、深刻有余而根基不足,可为一时之先,但难以常态化,学术传承颇有困难。其实,这也是美国现代化研究所面临的问题,跨学科体系之下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各个分支几乎都在一两代之后携带着第一代理论的一部分基因,回归各自的传统学科体系之内。

从社会方面看,这是改革深入推进后,体制内部矛盾暴露带来理论内在张力升级的体现。现代化研究鲜明的现实取向使其不可避免地牵扯到发展观、历史观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认为现代化理论具有西方中心倾向,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不相容的声音始终存在,尤其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的范式之争时起时落。现代化理论本身也是一个杂合体,中国的现

代化研究在创建理论框架时,基于兼收并蓄、融和汇通的理论愿景和谋求共识、共同破局的现实考虑,一些根本的观念差异和价值冲突被刻意淡化,革命与改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内因与外因、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政府与市场等矛盾的两极都收缩着缠绕在一起,处于一种原则性的共生关系和理想化的和谐状态。但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体制所内含的活力和矛盾逐步展开,更多的具体问题、更高的发展要求和彼此矛盾的诉求纷纷呈现。如果联系到世界各国现代化实践中的种种变异和变形,问题就更加复杂。此外,学术体制弹性空间的变化也改变着学术生态的基本样貌。于是,理论的内在张力升级,从中分化出彼此疏离的不同派别,早先的共识或蜕变为立场的对立,或者碎裂为观点的差异,或分解为众多回避性的细节研究。

还有学术因素与社会因素相混合的外因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势头日盛,从根本上冲击了冷战秩序,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在西方,左翼学生运动、民权运动、能源危机、滞胀危机等深深触动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根基;在非西方,以“东亚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市场化改革铺向全球,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影响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东亚模式、“中国模式”等非西方道路替代西方现代化方案的可能性被热议。这些都促使西方重新审视自身,多元文化主义渐成潮流。自由主义者认为文明本质上是多元的、平等的,无高下之分,各文明应相互尊重、和谐共处;不少保守派也认为异质的、冲突的世界文明秩序不可避免,美国应放弃强求一致的国际干预主义。在史学领域,这一思想转变的突出表现就是全球史的兴起。全球史本身错综复杂、派系纵横。早期全球史试图尽量完整地呈现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文明和某一历史时期世界的各个部分,关注人类历史的宏观结构与普遍动力,这与现代化理论的进步史观、比较史观有很多一致性。后期全球史与此不同。激进派强调“全球体系”的绝对性,文明之间联系的普遍性,试图消解现代世界的起点,为世界体系去中心、去结构、去等级、去方向。这种全球史观体现了多元

文化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是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和颠覆;而温和派强调多元汇通,试图以某一有代表性的考察对象为线索,将不同时空、不同历史主体、不同叙事角度和主题串联起来,糅合到一个叙事体系中,实现长时段、宽覆盖、多维视野、水平结构的网络化叙事。这既是对现代化史观的修正,也是对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修正,试图在主体化的宏大叙事和去主体化的碎片化叙事之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

多元文化主义兴起于西方学术界,是西方学术创新和社会发展双驱动的结果,也是西方文明自反性意识的体现。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这种主动“自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多元文明得到尊重,向人类历史的客观性靠近一步;另一方面,也可能形成误导,模糊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自我认知,阻碍其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路径。作为自近代以来饱受欺凌与磨难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素有自强图存、民族复兴的使命感和去“西方中心”的诉求,加上国际局势的变化和西方学术的转向,内因、外因叠加,这种努力很容易走向极端。在现代化研究的转型中,出现了某种值得警醒的趋势:乐于突出中国优越性,而自我反思减少了;宏大叙事衰落,微观研究扎堆;重视技术性研究而避谈结构性分析等。西方的“自反”是以现代制度和价值根基的确立为前提的,是一种基于“完成时”的自我批判,而对于一系列发展问题悬而未决、制度建设和社会转型尚处于“进行时”甚至“将来时”的非西方国家而言,刻意规避不同文明在发展程度上的客观差异而放弃体制层面和结构性的思考而盯住技术层面、量化的问题,这种过分超前于自身社会进程的跳跃式学术“接轨”恐怕还不适宜成为主流。

其实,现代化研究转型带来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方法,而在于方向。微观化、技术化、碎片化等趋势作为学术自身进化的结果,兼有正负效应,可以为学术自身的再进化所纠正,但从中折射出的历史方向感的模糊化、启蒙常识的“反常化”,确实值得忧虑。

余论: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再定向

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有始无终,成就与困顿相

伴,迭代递进。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更是如此,其艰巨性在当下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复杂化的地方情境对普遍化命题提出的质疑和挑战。后发现代化的推进,难在根基迥异、文化隔膜、细节繁复、变异无穷,引发的争议与歧见不可胜数。当千差万别的传统社会面对从外部强行植入的异质性社会经济关系时,究竟会生出何种应激反应,造成怎样的社会后果和制度变形,理论上难以预估,只有经历过才知道。与此同时,受本土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约束,外来制度和异质文化的移植大概率无法顺利、彻底推行,经典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总是存在一个或大或小、形式各异的夹角。那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转型困境到底是因为学习的样板不对,还是自身障碍过大、举措失当所致,各方争论不休。因此,现代性在非西方社会的大规模铺展可谓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大难题。

其次是矛盾渐次展开且不断发展的现代化实践对理想化原则提出的巨大挑战。如果说,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困境来自特殊命题的普遍运用、化约性理论的复杂化实践所造成的困难的话,那么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困境,则在于作为西方现代化理论修正形态以及与中国现实妥协产物的包容性命题、理想化原则相对于改革实践中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的滞后和无奈。

最后是外部环境诱导的认知错位。后发现代化的困境不仅来自外部环境的紧张和压迫,在某种情况下,宽松甚至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可能造成诱导。由于后发现代化国家与西方国家在发展阶段上存在时间差,两者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任务不同,解决方案也不同,甚至可能相反。后发现代化国家如果看不清这一点,很可能出现认知错位:忽略西方国家早期发展的根基,将其当前的阶段性问题视为西方文明的终极困境,从其自我反思的话语中寻找自我安慰、批判对方的依据,将其修正方案当成自己的发展方向,尤其当这种方案恰与自身传统存在某种形式上的契合时,就更能诱发侥幸心理,形成投机性的期待。这种隐

蔽而常见的认识误区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也是致命的。

4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在时代的呼唤中振奋起步,从蓬勃发展到范式转型,成就斐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深入把握现代性的特殊成分与普遍内涵,充分考察后发现代化的特异形式与核心要义,检讨旧方案,回应新问题,对现代化进行再探讨与再定向,正当其时,很有必要。在理解和继承中国现代化研究“初心”的基础上,延续、传承其理性根脉,拓展其容量和视野,保持和增进研究方法、学术风格、思想取向、研究层次的多元性,维持一个多元的、活跃的、热烈的思想者群落,既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现代化研究者们始终致力于推动并亲身实践的格局。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0-4031页;梁启超《敬告当道者》,《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65页。
- [2] 黄逸峰《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学术月刊》1979年第3期;宦乡《哲学社会科学要为国家现代化服务》,《哲学研究》1980年第8期。
- [3] 《现代化的概念和标准问题》,《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 [4] 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5] 李时岳《史学的革新》,《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86年第3期。
- [6] 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 [7] 黎澍《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陈之骅《世界史研究与四个现代化》,《世界历史》1979年第3期。
- [8]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责任编辑:修磊,才小男]